



学术文化书坊

学术文化书坊

文化研究的指南针与路线图

文化研究简史

〔澳〕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著

季广茂 译

揭示文化研究的要义
展现文化研究的历史
记录文化研究的旅程
图绘文化研究的地貌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文化研究简史

〔澳〕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著
季广茂 译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字：01-2006-04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简史/(澳)哈特利著;季广茂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51-090-6

I. 文… II. ①哈…②季… III. 文化-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3771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 John Hartley,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化研究简史

作 者	(澳)约翰·哈特利
译 者	季广茂
组稿编辑	王吉胜
责任编辑	谢艳芝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090-6
定 价	4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的指南针与路线图





【标点】

◎有人说：读横排书时，我们总是摇头，于是我们否定；读竖排书时，我们总是点头，于是我们肯定。

◎无论读横排书还是竖排书，都不必否定或肯定，更需要的是“标点”，即用心地“标”，尽情地“点”。没有“标点”，就没有体验，没有欣赏，没有记忆；就没有思考，没有汲取，没有生发。一句话，只能生吞活剥，而无法消化。

◎正是这“标”这“点”，构成了我们思想发展的可能的“路标”，构成了我们探究的“起点”、“生长点”。

◎“标点学术文化书坊”旨在传播西方最新学术文化成果。

◎它是学术的，但并非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还有面向大众的通俗神韵；它是面向大众的，但并非下里巴人，仍保持着应有的学术品格。

中文版前言

未来是开放的未来

约翰·哈特利

“为文明联邦效力是时候到了！”

《文化研究简史》的中文译者季广茂博士请我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前言。为了引发我思考，他提出了两个问题：

- (1) 本书出版后，西方的文化研究可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了何种进展？可否请您将其进展情形介绍给中国读者？
- (2) 您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是怎样的？文化研究是否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您看来，中国的读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貌似简单，其实不然。它们涉及观念（概念性框架中的问题），涉及时间（领域中的进展），还涉及空间（西方观念对中国情形的适用性）。事实上，我真的觉得文化研究面临着某些问题，它也一直面临着问题，而且本书自2003年出版以来，文化研究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作为观念史研究，本书必然将焦点置于过去，现在季教授的问题令我思考

未来,思考文化研究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

下列文字就是对他的问题的冗长回答。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也需要缜密的考虑,某些人可能是始料不及的。

《文化研究简史》曾经声称,文化研究是一种“丰裕哲学”(philosophy of plenty),是理解下列问题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增长、民主化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各类大型群体是如何创造文化价值的?不过,这些年代[即所谓“漫长的20世纪”(Arrighi, 1994; Brewer, 2004)]是以空前的社会剧变和意识形态剧变为特征的,此外还要加上帝国主义、全面战争、极权主义和“确保相互摧毁”(冷战),所有这些构成了进步的、世俗的科学现代性(secular scientific modernity)的阴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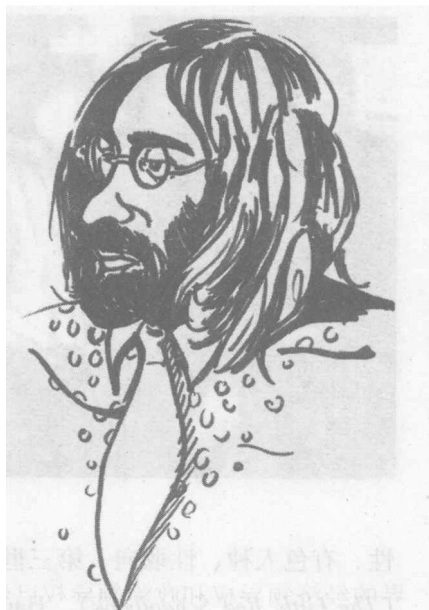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比这个漫长的世纪还要漫长的时间里,世界的经济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已经从欧洲霸权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式帝国主义,转向美国的企业管理式的资本主义。这个“漫长”世纪的终结,是以深入的变革为标志的,而且如此变革,通常被置于“全球化”这一术语之下。在某些人看来,人文科学、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都经历了所谓的“文化转向”,并与后工业社会或网络社会、“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密切相连。

西方人的心血

文化研究无疑是西方的文化企业,形成于也致力于明确地把大西洋的紧张状态改造成不断适应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承载着军事与经济实力,又承载着通俗文化,即好莱坞、摇滚乐、电视,总之除了体育无所不包(体育的全球化形态,即足球和奥林匹克比赛,都起源于欧洲)。

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走向辉煌并没有形成于美国霸权得以确立的20世纪30—50年代,反而形成于美国霸权在越南遭遇严重挑战之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通俗文化把自己的音乐重新输

约翰·列农 (John Lennon, 1940—1980), 英国著名歌手。1957 年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摇滚乐队, 该乐队是披头士 (甲壳虫) 合唱队的前身。1971 年春移居美国纽约, 并成为坚定的反越战主义者。1980 年被枪杀。



出美国, 因而美国在符号超级强权 (se-miotic superpower) 方面开始扭转乾坤。在这个过程中, 它把自己的独创由黑色蓝调 (black blues) 变为白色波普 (white pop), 从真诚表现被压迫者的身份变为全球每周最畅销的娱乐, 尽管这些都是以工人阶级创造性的疑惧和渴望为中介的, 体现在披头士合唱队的约翰·列农之类的明星身上, 后来还体现在与“性手枪”有关的朋克运动⁽¹⁾身上。

更不寻常的是, 乐手开始扮演新一代的知识领袖。“反文化”政治是通过商业音乐和波普文化, 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民主技术 (technologies of democracy) 和政党机器 (party machines) 得以传播的, 尽管两者以嘈杂的方式发生了碰撞, 特别是在标志性的 1968 年 (Gitlin, 1993)。就在那一年, 随着民权运动日益壮大, 马丁·路德·金⁽²⁾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 “五月事件”令巴黎烈火熊熊; 因为反战激进分子受到警察的攻击, 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转化成了暴力; 学生们在墨西哥城被枪杀; 大规模反对越战的游行示威使“风骚”的伦敦变得激进 (Halloran et al, 1970); 在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之春”来了又走了……青年文化从舞蹈转向了示威。

“和平与爱”⁽³⁾的“音乐与毒品”文化, “鲜花力量”⁽⁴⁾的嬉皮伦理, 以及源于女权主义和民权的“个人政治”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全都融入了“新社会运动”之中。“新社会运动”献身于头脑的扩张, 献身于女



“性手枪” (Sex Pistols), 英国著名朋克乐队, 成立于1975年, 解散于1978年。主张与世界彻底决裂和完全自我毁灭, 因而创造了摇滚乐最危险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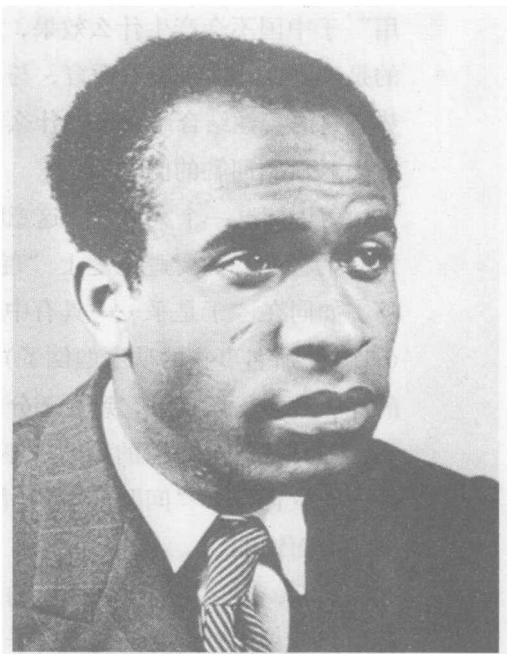
性、有色人种、性取向、第三世界、环境甚至儿童的解放 [《红宝教科书》(*The Little Red Schoolbook*), Hansen & Jensen, 1971]。一言以蔽之, “新社会运动” 献身于文化与身份的解放。这些运动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既定的劳工运动或代议政治, 尽管它们也曾与核裁军、反战激进主义有染。相反, 它们开始在文化阵地上创办属于自己的媒介和组织形态。这些媒介和组织形态通常也是一些商业企业, 包括唱片商标 (如披头士的苹果商标)、音乐节 (如伍德斯托克音乐节^[5])、 “地下” 新闻社、艺术 “事件”, 这些都是在节日 (文化) 而不是在工厂 (经济) 或论坛 (政治) 中形成的参与性的民主形态和政治感性。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的发展, 尽管与诸如来自第三世界的弗朗兹·法农和朱利叶斯·尼雷尔^[6]之类的倡导解放论的思想家一道, 自切·格瓦拉至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革命, 对西方反文化的激进主义者极具吸引力, 但现在的问题是, “婴儿潮”^[7] 一代的满腔激情是否创造出了比西方环境更持久的知识体系? 那些本质上属于西方的运动, 那些反抗西方自身社会构成的统治趋势的运动, 是否能给这个语境之外的人们提供任何教益? 说得更直接些, 文化研究这项事业何以应该引起今日中国或年轻人的注意, 又如何引起今日中国或年轻人的注意?

如果历史还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 那么, 致力于直接应用西方观念,

是不会有收获，即使那些西方观念被视为正面性的观念：

声称西方文明是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以及其他同样诱人理想的遗产的载体……对于任何熟悉西方在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时代的亚洲留下的记录的人而言，听起来都是空泛的。在这一长串的目标清单中，你很难发现，有哪个理想没有被那个时代的主要西方强权国家，或部分或全部地拒绝过。它们是在与直接屈从于殖民地统治（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或在与它们千方百计地获取宗主权的政府（中国）打交道时，或部分或全部地拒绝这些理想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你还是很难发现，没有哪个理想不是旨在反抗西方强权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不支持的。不过，在这些领域，在支持这些理想同时，非西方的人民和政府总是把这些理想与来自自身文明理想结合起来。在自身的文明之内，他们不需要从西方那里学习什么。（Arrighi et al, 1996）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20 世纪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先驱。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小学毕业后转往法国读中学，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曾经学习精神医学，出版过《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等著作。

换言之，如果把源于西方的知识运动视作征服当地土著的手段，令其输入全球南方^{〔8〕}或东方，那么，即使那些知识运动被视为解放主义的，它们也只是进行殖民的权力诡计。只有在被当成双方均有发言权的对话的手段来宣传时，它们才有价值可言。因此，把源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直接“应

用”于中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还可能损害双方的交流。相反，现在要做的是理解：就这个争端而言，与从自身语境的内部，竭尽全力地研究新形势具有的特性结合起来看，什么才是迫在眉睫的？这的确也是《文化研究简史》试图回答的问题。

就中国这一个案而论，这意味着既要避免走上“超英赶美”（盲目借用）的极端，又要避免走上“鸵鸟政策”的极端，即避免例外主义的托辞，如同在“于是乎……具有中国特色”这个常用短语中展示出来的那样（此举把命名事物的秩序颠倒了）。与其他西方观念一样，与文化研究相关的那些观念，还有对它致力于分析的问题而言非常重要的那些观念，近年来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的蕴含。不过，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特定环境，必定会重置这个“问题情境”。简言之，文化研究并非狗皮膏药，无法放诸四海而皆准。

那么，文化研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及其他读者、研究者将如何把文化研究的洞视应用于自身的前瞻战略？是否可以把文化研究的洞视从它原初语境中“抽离”出来，并依旧行之有效？或者说，它是否不再流行，不再是解释框架，而是需要解释的时代征兆？其实，如此事关文化研究自身解释力的反思性问题，是文化研究更加持久的特征之一，是它最为重要的动作之一。这里出现了一个知识探求模式，它主张进行所谓的“危急性”（依赖于特定语境）的分析，而不是“科学”的普遍主义；在这里，“问题情境”或“棘手问题”需要它自身的“概念框架”。

文化研究与社会变革

文化研究脱胎于理解社会变革的一种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知识上的努力，旨在表明，如何激发某些领域的社会变革，同时抑制某些领域的社会变革。

在我长大成人的时期和国家，即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在某些左翼人士看来，情形似乎是这样的：在那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地方，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盛行几十年的激进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是工会和劳工运

动，在政治领域中是工党），并未能够推动支持工人阶级或进步利益的决定性的社会变革（“革命”）。

而且，左翼还为 1956 年在苏伊士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所伤害。那时候，国际主义幌子下的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和苏联社会主义，都被剥去了伪装，对当地人显现为军国主义暴力，而毫无解放主义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这个用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备受宠爱的“概念框架”，也做了让步。其间，继二战的后方平等主义（home-front egalitarianism）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state-socialistic nationalisation）的短暂时期（即 1945—1951 年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连续几届投票赞成保守党政府。这些政府推动了消费繁荣，改善了住房与就业状况，还开始了去殖民化运动。某些左翼人士不免要问，如果普通人的利益与工人运动的利益“在客观上”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会觉得，聆听流行音乐（次文化）比投票给工党更为重要？

国内“冷漠”，国外“残暴”。既然如此，到处寻找进步性社会变革的新资源，就不足为奇了。文化研究一直是对这一僵局的扩展性回应。这种回应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从消极的层面上看，那些转向文化的人想知道，文化因素是否要为止早被预言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变革承担罪责？那些历史变革是受经济决定物和政治决定物驱使的。是否需要更好地理解有关文化的某些事物，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运作的某些事物？从积极的层面上讲，显而易见，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音乐、表演、电影、写作和其他艺术中，处于萌芽状态的青年文化、次文化、另类文化和反文化开始通过文化刺激社会变革。在使信息通俗化或动员行动社群（community of action）方面，这似乎比传统政党和车间鼓动家（两项累加）的所作所为，还要卓有成效得多。许多左翼人士深受由这些发展提供的可能性所吸引，尽管通俗文化是在商业环境中羽翼丰满的。在这里，商业企业似乎更具扩张性和交流性，能把“我们”这个社群连接起来。它并不符合剥削性和操纵性的“他们”（exploitative and manipulative “they”）这一陈词滥调，而左翼思想在传统上总是把公司的价值系于这一陈词滥调。

时至今日，这些东西都在文化研究上留下了烙印。这个危局（con-

juncture) 遗留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化、个人身份和价值探寻(这里的价值与消费、闲暇和娱乐密切相关)与社会变革有何关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文化(还有经济和政治)涉及社会变革,是否可以把它解释为既是退步的(由媒介和公司利益玩弄的意识形态操纵),又是进步的(自我实现;普通人的解放)?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种必然用于解释既定情境的知识工具理解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者换言之,如何才能根据社会变革自身的能动者来理解社会变革?这些问题都能完好地植入中国和当代语境之中。

此外,有人曾经预言,中国将成为“中心”,围绕该“中心”,下一个“漫长的世纪”将迈入最终确立的新秩序。如果这个预言真能变为现实,那么,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案会给社会变革的当代研究提供某种新东西。文化研究对经济增长/优势、政治领导/民主化和文化经验/身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长期关注,还是颇有价值的。因为文化研究是思考下列问题的地方:人们是如何体验对权力转移的回应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是如何强化或妨碍个人动能(individual agency)的?创造性价值(creative values)是如何形成并与经济价值发生冲突的?自我表演(performance of the self)如何可能推进或抑制政治变革?随着自己的经济体系走向成熟,在(以供应为导向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上,中国正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消费和服务市场,而(以供应为导向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确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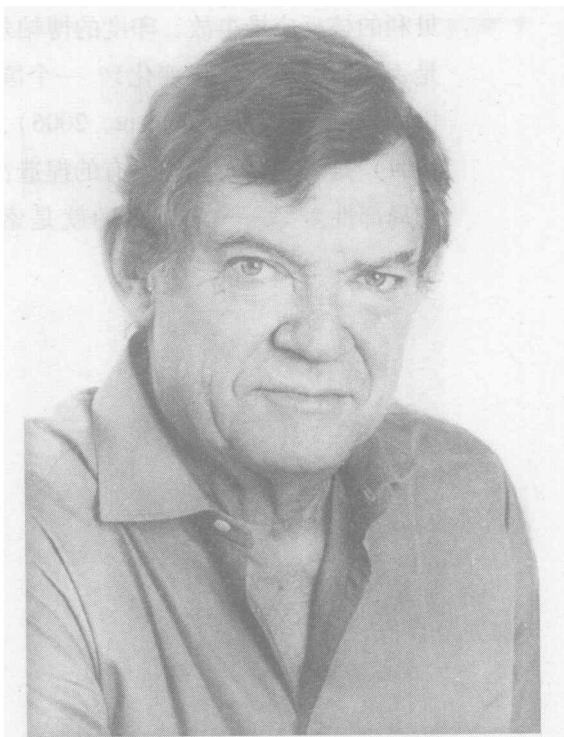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对于成熟老练、精力旺盛、颇具创造性的能动者(agents)——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这不可避免地冲击政治格局。增长和发展需要个人动能(individual agency);与此同时,这套体系的动力机制需要自发的秩序(市场),而不是中央控制(政令);无数个人能够在包括市场、娱乐、社会网络以及更加传统的政治形态在内的环境中实现自我。文化研究是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的帮手。理解社会变革,这一迫切需求首先激活了文化研究的生命,因为此时,现存的知识范式,包括科学的知识范式和政治的知识范式,均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变革的驱动器似乎已经由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

理解文化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这一需求依然处于全球化的世界之中，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

创造性破坏

在西方，文化研究一直是破坏性的知识力量。这对中国而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其中之一便是，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通常引发相当消极的反应，直到有一天，对它们的广泛采纳和拥有，用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话说，会缓和“新事物带来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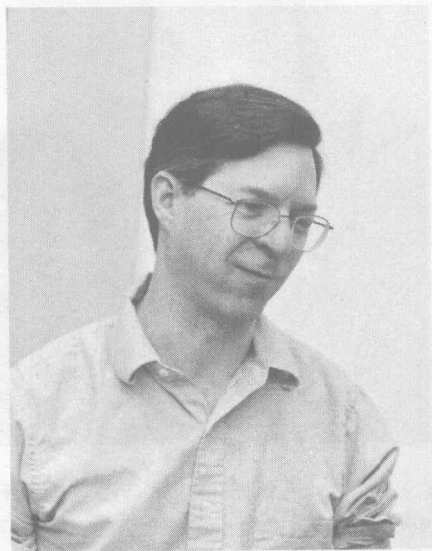
对于作为知识企业的文化研究来说，这向来是千真万确的。它吸引了众多的热能，因为它常常失口说出知识的实情：科学话语和政策话语往往忽视，甚至刻意保守一项“秘密”（Birchall, 2006）。这个处于知识的核心地带的“秘密”便是：全部知识都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因为知识的合法性是无法预先确定的。作者的权威性（专业证人），方法的适当性（科学），甚至观察的显然性（常识），所有这些都曾被文化研究以其“后现代”模式视作语言（而非现实）的辐射。它们是“建构物”，是借口托辞，是权力诡计，是面壁虚构。文化研究不断引来科学家、愤怒的经验主义者的嘲弄（Sokal, 2000），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在教育上是腐化堕落的，在专业上是丢人现眼的”（Windschuttle, 2000）。文



罗伯特·休斯于1938年生于澳大利亚，自1964年以来在欧洲和美国居住。从1970年起，他在纽约担任《时代周刊》的艺术评论家，著有《澳大利亚艺术》（1966）、《西方艺术中的天堂和地狱》（1969）等。

化研究还不断引来下列人士的讥讽，他们只想相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实(记者)。

但等热情消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是开业医生所谓的牵涉性痛。病因不在于文化研究，而在现代知识本身。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媒介文化”中，知识现在成了经济增长、公共政策、商务活动以及有知识的市民（更不必提那些老道的消费者了）的发动机。因为知识对于全部生产（包括经济生产、政治生产和文化生产）都极其重要，显然我们必须信任知识。同样“显然”的是，知识是不值得信任的。连续的合法性危机动摇了世界，“大科学”（big science）是否可靠（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事故、印度的博帕尔毒气事件、转基因食品、生物科学），是否实话实说（气候变化）？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伊拉克、伊朗）？政客（Independent, 2006）、记者（Danwei, 2007）和作者（Age, 2004）是否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捏造？从这些问题到对文化研究进行的小小的局部性羞辱——最著名的就是索克尔^[9]的愚弄（Sokal, 2000），都是如此。



索克尔（Alan Sokal, 1955—），纽约大学物理系数学，物理学教授。

文化研究喜欢对现实主义“文本”进行“解构”性的解读，它不仅活跃于文学虚构的安全护栏之内，而且还更加冒险地现身于现实中毫无掩蔽的海角，即现身于科学和政治之中。真理已经分崩离析，难怪那些在真理中豪赌的人会恼羞成怒。要么它无望地妥协于奠定全部知识根基的非确定性，要么它无望地被多元化，成了经验的财产，而不是事物的财富。例如，有些笃信宗教的人士既认可科学真理，又认可宗教真理，尽管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无法用同一标准来衡量。

由此观之，滑入主观主义，是难

以抗拒的。在主观主义那里，只要你喜欢，就是真理，如同电视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的著名概念“真理性”（truthiness）所表明的那样（scientificblogging, 2008）。尽管有人抗议，但真理只能是偶然的、中介性的和充满争议的。批评者倾向于责备信使，指责文化研究信奉它在文本中揭示的观点。他们有时坐立不安，因为文化研究通常操刀于可敬的知识边缘，操刀于大众接受教育的学院而不是享有声望的科学部门，或者操刀于诸如媒介、性别或文学研究之类的“微不足道”的题目，而不是医学院。简言之，文化研究被视为令人讨厌的家伙，只会把后现代理论家兜售给二流大学里天真无邪的大学生。

不过，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破坏征兆，使得观察者理查德·李（Richard E. Lee）宣布，文化研究是更大规模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的一部分。在那里，文化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发挥的作用，与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studies）对“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挥的作用完全一致（Lee, 2004）。理查德·李认为，文化研究与复杂性研究合在一起，标志着“不再强调均衡与确定”。在它们那里，因果性被加界定为“服从实验重复（experimental replication）和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的先决条件以及后发事件的持久联合”（Lee, 2004）。换言之，文化研究和复杂性研究分别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自发挥着现代主义知识范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作用。“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的著名短语。此举正在激发对全部知识领域的重新排序，在那里，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



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 1964—），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电视节目“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有一个环节，就是创造新单词。



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948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等。

的科学, 承载价值 (value-laden) 但又在经济上中立的文化, 均告土崩瓦解。科学和文化全被抛离了牛顿式均衡, 并被重新置于无可逆转的历史变革的“时间之箭”, 现在它们既需要注意历史的偶然性, 还需要关注个人定位。理查德·李写道: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那段时间, “新科学”强调复杂性、不可逆转性和自我实现, 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知识中的真理保证人的角色, 并把时间之箭重新引入自然科学。与人类世界一样, 自然世界现在已经拨乱反正: 它是创造性的, 未来是开放的未来 (当然不是可预言的牛顿式的未来), 只有创造性的选择和处于不稳定的转变时刻的偶然环境, 才能决定它。它具有这样的效果, 即把知识生产从下列难题中解放出来——寻求不可能的宇宙时, 一一剥离支离破碎的细节。在一个被视为具有全然创造性的世界上, 价值和知识, Wert (意义与价值) 和 Wissen (有关现实的体系知识), 是必然融为一体的。(Lee, 1997)